

通省落后与失衡分布：清代湖南武进士考论

王毓伟¹

(湖南科技大学 历史系,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清代重武科抡才，湖南武科不兴，于全国而言实属落后。清代湖南由于兵祸与分闹等因素的影响，各朝武进士分布不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地域分布不平衡，长沙府处于领先位置，湘西和湘南武进士人数稀少，常德府武进士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布特点。由于武科仕进较为困难，湖南武进士取得高位者甚为缺乏。湖南武进士的地理分布折射出清代湖南的嬗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清代 湖南 武进士 人数 分布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清朝定鼎中原后，为得折冲御侮之人，以武举方式抡才。自顺治二年（1645）举行武乡试，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永停武科，共开科 109 次，涌现了大批武备人才。前辈方家在论述清代科举时，未对武举进行深入考究，区域武举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清代湖南省情复杂，历经湖广分闹、改土归流和湘军崛起等事件后，地位逐渐嬗变。湖南省权扩张，带动了省内人才的兴起。湖南省内汉族苗族杂居，各府州民风不同，武科又有其特殊性，故人才分布与文举有所区别。考究清代湖南武进士人数及地域分布，对深入了解清代湖南省情大有裨益。

一、清代湖南武进士人数及时段分布

清以骑射取得政权，对武举十分重视，乾隆曾说：“周家以稼穡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1]受困于历代科举重文试轻武试，清代武进士并未像文进士般留有题名碑录，这对统计清代武进士信息造成极大困难。湖南省志《体育志》中认为“清代，湖南有 107 人中武进士”^[2]。但笔者利用光绪《湖南通志》《清实录》《光绪朝上谕档》以及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申报》和《京报》有关武进士的报纸信息等资料，统计得到的湖南武进士人数远超过 107 人。自顺治十八年（1661）周于愷和胡来贡首中武进士，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秦鳌、严中甲和胡善城中末科武进士，湖南共产生 165 名武进士。由于清代湖南省情复杂，各时期武进士数目并不平均，清代湖南武进士时间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清代历朝湖南武进士人数

年号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科数	7	21	5	27	12	15	5	6	11
进士数	2	17	9	40	11	15	1	21	49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8B678）

作者简介：王毓伟，男，湖南湘潭人，汉族，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湖南地方社会历史。

平均值	0.286	0.809	1.8	1.481	0.917	1	0.2	3.5	4.455
-----	-------	-------	-----	-------	-------	---	-----	-----	-------

有清一代，共录取 9514 名武进士，湖南只有 165 名，可以说是武科落后之地。从上表还可以看出，清代湖南武进士数量在不同时间段存在着较大差异。笔者将其分为 5 个阶段，探究此种分布的原因。

第一阶段：顺治朝极度落后时期。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尤见中外同心，共相拥戴，特允所请，定于十月初一日即位”^[3]，清从法统上取代明成为统治王朝，但天下并未一统，湖南反清斗争尤为激烈。湖广地区是南明与清激战之地，人才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力量。

湖湘文化受理学影响深重，忠臣不仕二主观念深厚，很多湖湘子弟或誓死不降或退隐山林不仕清廷。如“（王夫之）曾走桂林，依桂王，图恢复。旋知事不可为，遂决计不出”^[4]。加之，兵祸造成人口大减。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时，南明溃兵“历益阳、宁乡蹂躏五百里，过湘乡分札四十六里，焚掠三月，杀死男妇数十万口，牛种罄绝，田土荒芜，寻遁去，湖南始平”^{[5]279-280}。

除南明溃兵蹂躏湖湘外，清军也大肆屠杀。顺治六年（1649）正月，清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因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坚守湘潭，以“余贼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方止”^[6]。至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永历帝在咒水之难中被俘身亡，湖南才暂时摆脱兵祸。

长期的兵祸造成湖南地区人丁稀零，“历年仅得老幼一千二百人，逐名搜括入册，遂无留余以待缺额”^[7]，酃县在顺治朝人口几近全无。尽管顺治朝广纳人才，每次武科都有一、二百人得中，但以上两个原因致使湖南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才有周于愷首中武进士。据王金龙考订顺治朝 7 科共有武进士 1411 人，湖南才 2 人，可谓落后至极。

第二阶段：康熙朝相对落后阶段。这一时期，除三藩之乱外，湖南整体处于和平时期。“及吴三桂反，湖南州县俱陷”^[8]，吴三桂进据湖南后，一直以湖广为前线与清军对峙。甚至“十七年（1678）戊午正月朔，吴三桂称帝于衡州”^[9]。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彻底平定。为恢复民生，康熙诏令：“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10]承借康熙的休养生息政策，“康熙三十九年（1700），湖南通省地丁杂税等项钱粮著一概蠲免”^{[11]23}，湖南经济逐渐复兴。顺治和康熙两朝亦不断推动江西等地人口迁入湖南，人丁逐渐兴盛。

康熙十八年（1679），规定每科武举共选 100 武进士，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每科各省武进士数额差距较大才不定数额。由于湖南在康熙朝属于湖广行省，武科乡试名额也统归在湖广之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划定湖广每科 50 名武举人。当时，湖广总督驻扎于湖北荆州，湖广中心在湖北而非湖南，乡试中湖南试子处于弱势地位。在此情况下，21 次殿试能有 17 名武进士的出现，相较于顺治朝而言已是极大发展。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康熙时湖南每科基本都有武进士涌现，实际上这 17 名进士出现年份是：康熙三年（1664）3 人、康熙九年（1670）1 人、康熙十二年（1673）1 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1 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1 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2 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1 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1 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2 人、康熙六十年（1721）3 人、临湘人余昌志科次无考。故而康熙时期湖南武进士人数虽有发展，但仍有 11 科次未出现武进士，此时武举仍可谓相对落后。

第三阶段：雍正至道光朝发展阶段。由于湖南考生在文试中屡屡失利，湖南要求独设贡院的呼声不断高涨。雍正元年（1723）清朝终于颁布上谕：“于明春即分湖南、湖北两闱考试。倘为期已迫，预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12]湖南独设贡院后，“分湖北、湖南乡试额，湖北中式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举各二十五名”^{[11]2845}。武举人数量有了充分保障，对于试子考取武进士更为有利。

这4朝共开科59次，湖南除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科、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和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等8科无人得中外，均有武进士。相较于前两个阶段而言，此时期无论是进士总人数，还是平均得中人数相较于前两阶段都有较大发展。值得注意的，嘉庆朝湖南武进士较为颓势，12科中只有11名武进士，平均一科不足1人。但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科考试是凭借自身实力而获取功名，嘉庆时期武进士人额相对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第四阶段：咸丰朝暂时衰落阶段。“清治至道光而极敝”^[13]，内忧外患导致清朝统治危机深重。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自广西起兵，与清分庭抗礼十数年，南方各省再次陷入战祸之中。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湘潭之战失利后，再也未能对湖南发动大规模战事，但小规模战役依旧时有发生。湘军崛起后，众多湖湘子弟投身军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武科人才匮乏。如同清初兵祸，太平天国战争导致湖南损失惨重，人口和经济均遭受严重破坏。在战争环境下，甚至停开了壬子和乙卯两科武乡试。

整个咸丰朝，只有安福人彭化龙于咸丰十一年（1861）得中武进士。不过整个咸丰一朝5次武殿试也只取中172名武进士，湖南这一时期武进士人数稀少在情理之中。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南崛起，在全国地位嬗变，故而咸丰时期武举的衰落只是暂时的。

第五阶段：同治和光绪两朝辉煌阶段。同光时期是武举走向衰败直至消失的时期，但于湖南而言，却是武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湖南）咸丰以来，武职繁众”^[11]3059，官至提督者高达数百人，总兵和副将之数更甚，这大大刺激了湖南人投身军旅以获取高官之位的想法。当时湘军被裁撤，国家额定兵人数减少。对于非世袭兵的湖湘子弟而言，若想建立军功，只能仰仗于武举。湘军回乡后，带回大量财物，“诸将帅还者，挥霍烜赫”^[14]，奢靡之风浓厚。在挥霍财物的表象下，湖南经济得到畸形复兴，武备人才猎取功名也有可靠的经济保障。

这一时期，湖南武进士人数总量是历朝以来最多的。总数达到70人，17科次皆有人得中。并且武进士人数在5人以上的科次有：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5人、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8人、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5人、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7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5人、光绪二十年（194）甲午科5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5人。虽然武科最终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废止，“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15]，同光时期是湖南武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众多的武科进士也使“无湘不成军”一语更有说服力。

二、清代湖南武进士的地域分布

湖南“东控安成，南连岭峒，西通黔蜀，北限大江”^[11]438-439，境内汉、苗和瑶等族杂居，各府州厅在经济、风土人情和人文教育上相异性较大，武科进士数量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虽然武进士未有登科录和题名碑录等流传，但武殿试金榜、湖南通志、府州县志以及晚清报刊资料等对武进士籍贯都有所记载，故而湖南籍武进士的县属较为明晰。

但或因抄录有误、或因错记漏记造成各种资料出入较大，一部分武进士的县属甚至是否为武进士都有待商榷。如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武进士胡来贡，光绪《湖南通志》中未记录，但光绪《善化县志》中有所记录；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武进士周于愷，光绪《湖南通志》中记录其籍贯为长沙县或善化县，光绪《善化县志》中明确列为善化人，同治《长沙县志》也将其列为长沙县人；光绪《湖南通志》中将靖州人张应奎列为武进士，但光绪《靖州志》中未收录其人；县属无考者还有11人。此11人分别是：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武进士张黄甲和谢松庭；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武进士严宗和与贺鸾翔；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武进士黄开甲；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武进士曹云臣；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武进士萧锦、唐高林、甘大铤、孟藩铭和叶穿扬。笔者在权衡之后，以光绪《湖南通志》为主要参考，以府级单位为标准大致描绘出了清代湖南各府州厅武进士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清代湖南各府（州、厅）武进士人数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合计
长沙府	2	5	1	9	2	4		3	15	41
常德府		6	4	12	2	4		2	1	31
澧州		1		5	1	2	1	3	5	18
辰州府			2	5	3	3		4		17
永州府				1				4	7	12
岳州府		3		3	2			1	2	11
衡州府		1	1			1		3	3	9
宝庆府		1		2		1		1	4	9
靖州				1	1					2
凤凰厅			1							1
沅州府				1						1
桂阳州				1						1

清代湖南政区沿革经历了漫长过程，康熙三年（1664）诏令：“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16]雍正元年（1723）湖广分闱后，湖南彻底独立成省。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新设永顺府和升岳州府属澧州为直隶州；雍正十年（1732），升衡州府属桂阳州为直隶州；乾隆元年（1736）升辰州府属沅州为府；嘉庆二年（1797）升辰州府属乾州、凤凰、永绥3厅为特别行政区；嘉庆二十二年（1817），析沅州府芷江县地置晃州直隶厅^{[17]149}。“（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华容县属乌咀地置南洲直隶厅，以洞庭湖涨沙地并析华容、安乡等县隶之”^{[17]151}。终清一代，湖南辖9府、4直隶州和5直隶厅。从上表可看出，湖南各府州厅之间武进士数额差异较大，各地武进士也并非均衡地出现在每个时期，湖南武进士分布有如下特点：

（1）长沙府武进士数量领先，但并不突出。自雍正朝两湖地区彻底分省后，长沙城的政治地位不断抬升，影响了长沙府的整体实力。长沙府自古以来就是湖南发达之地，顺治和康熙年间因屡遭兵祸而实力倒退，但康雍乾3朝的休养生息使得长沙府得以恢复往日繁荣。“世之习武者只求入彀，博取科名”^{[18]105}，长沙府的武科人才也未能避免流于俗套。

殷实的环境，加上武科相较于文科更易获取功名，使得长沙府出现了较多有志于沙场的人才。长沙府武进士数量领先全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沙府所辖甚广，而且都是富庶之地。“康熙三年（1664），以沅抚移镇长沙，分藩于郡，隶湖南布政使司，额州一县十一”^{[5]85}。

长沙府的41名武进士包括：长沙县12人、湘潭县6人、善化县6人、浏阳县4人、湘阴县4人、攸县2人、醴陵县3人、

宁乡县 2 人、益阳县 1 人和安化县 1 人。除茶陵州和湘乡县外，其余 10 县都有武进士，这说明长沙府武进士人数领先全省是通府的力量，而非一县独强。虽长沙府武进士人数在全省较为领先，于全国其他府而言，实则不算突出。

(2) 湘西和湘南少数民族地区武进士人数稀少。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指出，武科弊端之一就在于“力士多出藜藿，而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19]42}。湘西和湘南为湖南偏远落后之地，经济不甚发达，难以培养应试于武科的人才。家庭困难的武备人才投身军旅以获仕进，而非投身制科之中。

由于湘西和湘南多少数民族人群，为苗疆和瑶疆之地，每遇天灾人祸，苗民和瑶民多动乱。乾嘉年间屡兴兵伐，也导致湘西和湘南本已落后的面貌更甚，自然无余力培养人才。加上武科考试，须行文试，“而世之习武者，武经尚属茫然”^{[18]203}。更遑论少习汉文的少数民族之人，故而湘西和湘南基本少贡献武进士。

湖南 17 个府级单位中，只有永顺府、郴州直隶州、永绥直隶厅、晃州直隶厅和南州直隶厅 5 地未产生武进士。其中，南州直隶厅成立之时，武科也走到了尽头，其余 4 地均位于湘西和湘南。其他湘西和湘南之地，除永州府外，武进士也数量极少。靖州直隶州下辖会同、通道和遂宁 3 县，只有 2 名武进士；沅州府下辖芷江、麻阳和黔阳 3 县，只有 1 名武进士；凤凰直隶厅、桂阳直隶州和乾州厅都只有 1 名武进士。广阔的湘西和湘南地区，武进士人数匮乏，实与经济和文化落后有关。

(3) 常德府武科颇具特色。湖南通省的武科特色是清前中期武科人才匮乏，咸丰之后，武科进士激增。但常德府却与此相反，清前中期武科人才兴盛，同光年间却少见武进士。顺治四年（1665），清军攻占常德府，是湖南较早被纳入清朝版图的地区。此后，“国家轻徭薄赋，尽除前代苛政，与之休息，每遇水旱偏灾无不蠲赈”^{[20]26}。

得益于与民休养的政策，常德府恢复较快。同时，常德府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常德为古黔中地，控引巴蜀，襟带洞庭，为往来滇黔舟车要道”^{[20]33}。作为湘西北门户之地，常德府颇受统治者重视。为钳制西南诸省，“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湖广提督移驻常德府城”^{[20]27}。由于领兵提督驻扎与此，常德府武风较为浓厚，故而康熙、雍正和乾隆 3 朝武进士较多。“嘉庆二年（1797）丁巳，奉议提督移驻辰州府，左营官军全行移驻，并添设后营。”^{[20]29}此后，常德府武进士数量下滑严重。

常德府下辖武陵、桃源、龙阳和沅江 4 县。除沅江未见武进士外，桃源县 16 名武进士、武陵 13 名武进士、龙阳县 2 名武进士。就县属来看，桃源和武陵两县遥遥领先于湖南其他县州。同治《武陵县志》中曾论“国朝二百余年来，仅得十二人，又皆品秩不甚”^[21]。虽放眼于全国，武陵武进士人数确属中下，但就湖南而言，桃源和武陵可称为武进士之乡。

三、清代湖南武进士的名次及仕进

清制武科进士依例除官，武科进士初授官职品秩一般高于文进士。“初制，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授一等待卫，二、三名授二等待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22]3171}。较之文举人才老死于科场，武科功名也容易获取，一些地方“当岁试（武会试）之年，辄搜罗充数，往往不及额而止”^[23]。对武科人才而言，武进士功名既是对自身实力的肯定，也是获取上层地位的最快途径。

对一省而言，武进士名次虽不能完全反映一省武风之状况，但也是该省整体状况的一个考量因素。由于缺乏武进士题名碑录，顺治和康熙年间武进士名次大多不可考，《湖南通志》等地方志书上也只是记载了武进士获取功名的时间和官职，故而无法全面描绘出一、二、三甲武进士的具体分布情况。笔者仅就能搜罗到的湖南清代武科鼎甲人物做一简单分析。

清代湖南武进士鼎甲人物只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榜眼武陵人石钧、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榜眼桃源人李世论和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榜眼邵阳人桂林香 3 人。石钧和李世论皆为常德府人，也说明了常德府在清代湖南确是武风兴盛之地。

此外，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桃源人万岱和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华容人谭鳌均高中传胪，也算湖南武科中成绩突出者。清代武科如同文举般各省差异极大，直隶和山东两省鼎甲人物极多，而湖南鼎甲人物稀缺。湖南统共 165 名武进士，只得 3 人为鼎甲人物，终清一代无状元出现，会元也未见于史料。绝大部分皆二、三甲武进士，也从侧面反映了湖南武科不兴。

武备人才仕进之途较多，武科也未被视为是“正途”，武科名次对官位升迁影响有限。沈葆楨曾说：“然文职以科甲为正途，而武职科甲升阶独居行伍军功之后，则祖宗立法之精意，不可不深长思也。”^{[24]346}“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19]42}一语更反映出武备人才若想获取高官必得历经行伍磨练，靠军功晋升。虽然“今夫武科之设为遴选将才计焉”^[25]，实际上清廷将才多由满蒙贵族和汉人军功出身者充任，武科进士担任参将以上官职者已属成功。清代湖南武科进士的入仕情况见表 3。

表 3 清代湖南武进士官位较高者

	中进士时间	县属	职衔
裴鱣	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	常德府武陵县	黄冈副将
王之弼	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科	澧州直隶州	开封副将
车果	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	宝庆府邵阳县	云南参将
万岱	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	常德府桃源县	榆林镇总兵
郭璞	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	常德府桃源县	陕西凉州镇总兵
张震	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	岳州府巴陵县	宁夏参将
万巍	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	常德府桃源县	陕西参将
邓盛德	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	长沙府浏阳县	崇安营参将
李世谔	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	常德府桃源县	江西参将
郭勋	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	常德府桃源县	海门参将
唐光申	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	沅州府黔阳县	黎平参将
谭麟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	长沙府攸县	陕西参将
罗廷弼	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	辰州府沅陵县	陕西副将
钟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科	宝庆府武冈州	广东肇庆协副将
欧阳焕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	永州府宁远县	山东参将
刘长清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	岳州府巴陵县	四川提督
王定堃	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	长沙府宁乡县	副将
陈定奎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	常德府武陵县	署副将

彭三元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科	长沙府善化县	参将赠副将
蒋锡光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	宝庆府武冈州	总兵
桂林香	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	永州府祁阳县	总兵

湖南武进士功名不显，获得实权职位者甚少。上表中官至从一品者提督仅 1 人、正二品者总兵 4 人、从二品者副将 6 人、正三品者参将 10 人。虽是不完全统计，也能大致得出湖南武进士仕进不顺的结论。“据光绪十一年（1885）刊的《湖南通志军功》，近代湖南因军功而获游击以上职衔者的数量，长沙府提督 331 人，总兵 750 人，副将 1053 人，参将 906 人，游击 1342 人，合计 4382 人”^[26]。这仅仅是长沙一府晚清时期的军功人才，更遑论整个清代湖南省。与军功人才相比，湖南武进士仕进大为逊色。

湖南武进士获得参将以上职衔者，7 人来自常德府、4 人来自长沙府、3 人来自宝庆府、2 人来自岳州府、2 人来自永州府、1 人来自辰州府、1 人来自澧州直隶州、1 人来自沅州府。从府属和县属的情况而言，常德府桃源县堪称清代湖南武科最兴盛之地。清代桃源县武进士人数排名全省第一，出现了榜眼李世谔，武进士高官者 5 人也领先全省其他县州。从时间上看，乾隆朝是湖南武进士高官出现的高峰时期，有 12 人。

这主要与乾隆时期开科 27 次、为清代之最，乾隆帝在位长达 60 年有关；二则是与乾隆时期军事战争较多有关，“即乾隆六十年中，缅甸、安南、大小金川、廓尔喀诸大役，高宗纯皇帝十全武功，震耀四海。”^[27]同光年间湖南武进士官位不高，一是由于“顾自军兴而后，窃计国家所以收得人之效者，多半由额兵练勇而来，科目之荣，远不逮也。”^{[24]346}二是武科进士脱离时代，未能掌握近代军事技能，不受重用情理之中。

入清以来，湖南武进士整体状况变化明显。顺治和康熙两朝湖南百废待兴，武科落后；雍正元年（1732）湖广分闱后，湖南武科渐盛；咸同年间湘军崛起，湖南地位不断抬升，配合民间武术文化的繁荣，湖南武进士显著增多。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科废除后，湖南仍被视为武风兴盛之地。虽然武科入仕难度小于文科，但武科前景远逊于文科，“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指文科庶吉士），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22]3165}。

湖南武进士大多品秩不高，职权不隆。加之武科重弓和马，湖南人却不善骑射。故而，同样是获取功名的手段，湖南武科受重视程度却远不如文科。清代湖南科考文进士一共 737 人，武进士只有 165 人，足以说明通省人才重文轻武。使得全省只有桃源、武陵、长沙等县武进士较多，但十数名武进士于全国而言仍是落后。武科取士已远离时代良久，研究武科看似只有学术价值，实则也能为研究现今湖南体育人才分布提供现实价值。研究清代湖南武进士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可一窥清代湖南各地的状况，为现今各地培养人才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昭槠. 嘯亭杂录·续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 [2]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省志: 体育志[M].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4: 18.
- [3]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M]. 北京:京华书局, 1986:88.

-
- [4]姜涛. 中国文学欣赏精选集: 第20册[M]. 台北: 庄严出版社, 1983: 54.
- [5]吕肃高. 乾隆长沙府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 [6]陈嘉瑜, 王闾运. 光绪湘潭县志: 1[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474.
- [7]唐荣邦, 杨岳方. 同治酃县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429.
- [8]小横香室主人. 清代野史大观[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1: 15.
- [9]孔昭明.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第六辑[M]. 台北: 大通书局, 1987: 33.
- [1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史编年: 第2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13.
- [11]曾国荃. 湖南通志[M]. 北京: 京华书局, 1967.
- [12]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78.
- [13]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5.
- [14]陈嘉瑜, 王闾运. 光绪湘潭县志: 2[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96.
- [15]沈桐生. 光绪政要[M]. 上海: 上海崇义堂刊本, 1909: 61.
- [16]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M]. 北京: 京华书局, 1986: 175.
- [17]周宏伟. 湖南城区沿革[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8]夏东元. 郑观应集: 上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9]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20]应先烈. 嘉庆常德府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 [21]欧阳烈, 杨丕复, 杨彝珍. 同治武陵县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396.
- [22]赵尔巽. 清史稿: 第1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3]陈其元. 庸闲斋笔记[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77.
- [24]朱华. 沈葆楨文集[M]. 福州: 福州市社科院、社科联、船政文化研究会, 2008.
- [25]邵之棠. 皇朝经世文统编[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0: 2922.

[26]陈松. 清代长沙城市地位的嬗变[D]. 成都:四川大学, 2007: 29.

[27]欧阳兆雄, 金安清. 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86.